

三洲传统聚落形态特征及其成因

李华珍

(福建工程学院 建筑与规划系, 福建 福州 350008)

[摘要]在实地调查与文献解析的基础上,从选址与边界、组团布局与街巷体系等几个方面,探讨三洲古村的聚落形态特征,并试图找出影响其形成的自然与社会文化方面的内在原因,以期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三洲聚落的历史文化价值。

[关键词]三洲古村;聚落形态;组团布局

[中图分类号]K9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12)04-0088-04

聚落形态一般包含了实质空间形态与隐藏其后的社会形态。其空间形态一般被形象化成一种空间图式,容易被人的视觉所认知。但其深层的社会形态及空间形态的成因却是比较复杂的,不能让人一目了然。一般而言,聚落的空间形态不是自然形成的,也不是个人意志决定的,而是受聚落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形成的。正是因为各地自然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不同,才造就了不同地域不同的聚落形态。本文试图以三洲传统聚落为例,在解析其空间形态的基础上,分析影响其成形的复杂的内部原因,以探讨天一地一人复杂的关系。

一、地理位置

三洲乡位于福建省西部长汀县南部,距长汀县城34公里,距国道319线、河田火车站10公里,距厦蓉高速公路河田出口仅7公里,交通十分便利。该乡地处武夷山脉南端,丘陵地貌,海拔高度在240—560米之间,属于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土壤以砂质红壤为主。

全乡面积64.45平方公里,辖蓝坊、小潭、三洲、曾坊、戴坊、邱坊、桐坝、小溪头8个行政村。乡政府在三洲村,本文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就该村而言的。三洲村位于汀江与南山河交汇的河间盆地上,聚落周围田畴广袤,绿水穿梭其间,远处群山连绵起伏,环境十分优美。

二、历史沿革

三洲是典型的客家聚落,其历史悠久,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1987年福建省文物普查时,在戴坊庙崇山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陶片、石镞等,同时在曾坊村的蓑衣岭、鹅形山等地发掘了青铜器时期的遗址。三洲可谓是汀江流域新石器文化的摇篮。故《长汀县志》有“没有汀州,先有三洲”的记载。

三洲的开发与发展与中原移民的入迁有很大的关系。最早到三洲定居的姓氏是陈、程、罗、古、

林、董、潘七姓。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七姓人先后离开了三洲。其后又有温、俞、丘、张、傅、戴、黄等姓陆续迁来。据各姓族谱记载,三洲温氏的祖先在唐朝中后期入迁;唐朝末年戴钧钟由于避黄巾起义之乱从江西迁居三洲;明代,黄氏迁居三洲,在此繁衍发展。在这过程中三洲也逐渐蔚为大观。现在三洲900余户的居民中有三分之二是戴姓,三分之一是黄姓,其余的都是人数极少的小姓。

据《临汀志》记载,南宋汀州已有“河田墟”与“三州墟”,即现在的河田镇与三洲乡。三洲位于汀江北岸,境内的汀江河道虽然仅10.5公里,但因其距汀州府很近(一天的水路行程),各地依托汀江航运的船只都要经过此地,是闽粤赣边界重要的水上交通枢纽,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不言而喻,曾被人们形容为“日见船帆不断,夜泊船桅成排”。三洲也是上杭至长汀的官马驿道的必经之路。商贾云集,商旅不绝,三洲的米、谷、豆、生铁等产品从此运出去,外面的盐、布匹、百货、糖、纸、京果、海产品等货品也由此进入三洲及周边的区域。繁忙的运输、货物集散的优势、交通的便利、与外界不断的交流接触,三洲的经济、文化发展迅速,逐渐形成了早期的集镇——三洲墟。

至明、清时期,三洲更是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其商贸重镇和货物集散中心的地位更趋重要,据《清史稿》记载,明清时期还曾在此设立“三洲驿”,与临汀驿、馆前驿并称为当时汀州府的三大驿站。三洲已由商贸重镇逐步成为有一定政治影响的重镇了,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绿色飘带(汀江)上的一颗明珠”。便利的交通条件与经商环境使得相当一部分三洲人因从事商业贸易而发达,转而又购买了大量的土地,雇佣大量佃农耕作,使得三洲本地的居民大多还是以种田为生的。而因为水陆交通的发达,三洲也有一部分人以撑船或挑檐(担)为业。三洲也因而成为了一个综合性的聚落。清末,由于河床升高,河道堵塞,三洲逐渐失去了水路码头重镇的优越地理位置,转变成为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传

[投稿日期]2012-04-11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2011B041)

[作者简介]李华珍(1978—),女,福建古田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建筑历史与文化。

统村落。

近代，三洲也是重要的革命根据地。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曾亲自在三洲成立了永红乡苏维埃政府，使永红乡成为“中国红色第一乡”。

三、聚落形态及其成因

（一）因地制宜、凸显防御的选址与边界

汀江自北向南蜿蜒而来，两岸形成了相应的河流冲击平原。南山河从自东向西流来，在曾坊与汀江汇合，汇合处形成了一个丁字形，将陆地分隔成了三块，三洲就选择在汀江环抱处北面的一块河间盆地上发展起来。这样的盆地不仅土地肥沃，灌溉与交通便利，而且可以减少水流的冲刷，尽可能减轻洪水的危害，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村落周边尽是宽阔平坦的良田，一直绵延至远处的山脚下。村落远处四周是连绵起伏的山脉，东北以洋山岭为主山，洋山岭属于武夷山脉南端的余脉，连绵起伏，南北两侧有山势较低的护龙，周边有宽阔的农田为明堂，汀江与南山河从西南与南边蜿蜒流过，远处又有一些不高的小山包，恰好成为朝案。这样的地理环境正是传统农业社会中最佳的人居环境——山环水抱、负阴背阳、中有明堂的风水格局。北部高山起伏，可以挡住冬天的冷风；南部明堂开阔，朝案低服，流水环抱，北高南低，既可以带来夏天的南风，又有利于村落排水、泄洪。这样的选址，从今天科学的角度看也是十分合理的。

三洲先民在聚落营造的时候，充分利用了有利的地理条件，同时还积极发挥聪明才智，充分利用人工手段，优化聚落居住环境。元朝以前，三洲是开敞的墟场，没有防卫的城墙，任何人都可自由出入。但由于三洲地处汀州南路官马大道和水路交通要道，连接长汀与上杭、武平方向的交通来往，历来受到战乱、土匪、流寇的侵扰比较严重，墟场及村内百姓财产常被洗劫一空。特别到了元代，时局动荡，盗贼丛生，三洲受到的冲击也就特别严重。元末，戴应寿将军返乡后，与村中有威望的乡绅商议加强防御。他先是发动乡亲改革木栅栏防寇，后来巧妙地利用了各户高大的封火墙，用砖石筑城墙将村庄四周边现有的封火墙连接起来，形成“船”形布局，这样既节省了费用，也节省了时间。同时，修建东门、南门、西门、北门、午门、乾门六处寨门，并在其上修建门楼。村中按五行方位挖有东宫、南宫、西宫、北宫、中宫五口水井，供奉水母娘娘。环城同时开挖池塘、塘塘相连，用于防寇护城及养鱼，将挖池塘剩下的弃土用于修建船头帽和五个风水土墩（分别是马打坪、东林寺、田背庵、荏下、矮撩）。在船头帽前方、东北方向的洋山岭上修建

文昌阁，与西南方向的笔架山遥遥相对，形成了传统社会中有利于“发科甲”的布局。还在洋山岭脚下沿南北两边分别人工开挖了一条水渠，形成了“人”字形布局；水渠又汇入汀江，将整个聚落包含在内，从平面上看就像是一艘船在向着文昌阁的方向航行，寓意三洲居民人文昌盛，一帆风顺，风水的象征意义十分明显。三洲也因此成为长汀古代乡村唯一一座有城池的村落，边界明确。三洲的城墙与城门一直完整地保存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末，为开发基本农田和开展集镇建设，城墙与城门陆续被拆除，现仅余部分城墙根与一个南城门。至今，村中的一些地名仍然可以体现当时的聚落空间布局情况，如“城心里”（长汀话即城内）、“城墙坎下”（即城墙根）、“东门”、“南门”、“西门”、“上乾路”等。

除了物质层面的聚落边界之外，三洲先民还构筑了精神层面的聚落防御体系。三洲现存的宗教庙宇较多，而且大多分布在村落的边缘及外围。南门内，紧贴南门城墙建造了圣帝庙，前殿供奉关公，后殿供奉孔子，充分反映了当地崇文尚武的精神。北门内则修建了三闾大夫庙，供奉屈原。供奉惠利夫人的东宫庙、西宫庙与北宫庙，也都位于村落各个方向的边缘。这些神灵组成了聚落边缘的防御系统。而在聚落的外围，由文昌阁、东林寺、西林寺、回龙庵、安公庙等宗教建筑还组成了又一道保护圈。在传统的乡土社会当中，人们相信，虽然各种神灵的职司不同，但借由他们的神力可以镇住不安全的、或者人们还无法控制的神秘力量，阻挡它们进入聚落内部，从而营造安全、宜居的居住环境。这种心理层面上的防御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更能给聚落里的村民带来强有力的心灵慰藉，从而获得稳定的安全感。

（二）彰显宗法血缘关系的组团布局

三洲聚落以上街为轴分成南北两个大组团，上街以北的组团面积较小，主要是黄氏的聚居地，其民居基本是以黄氏家庙为中心展开布局的；上街以南主要是戴氏的聚居地，这里分布着十几个戴氏的祠堂，有总祠，也有各支各房的支祠。总祠（明德堂）位于下街的街尾，这里虽不是村落的中心，却是三洲村民进出村落的必经之路，交通便利，四通八达；祠堂周边留出了宽阔的大埕，供三洲戴氏合族及其外迁的子孙祭祖、集会之用，在戴氏居民的心理中是当仁不让的核心建筑。戴氏各支祠则分布于村落的各个部位，各房支的民居基本以本支系的祠堂为中心或依托展开布局，形成一个个小组团；而支祠及其之前的门埕，则成为各房各支举办红白

大事,商议本支大事的主要场所。在戴氏聚居的组团中,还穿插了俞、温、丘等小姓,各姓民居也分别以各自的祠堂为中心形成一个个小组团,这种布局是传统聚落的典型布局方式,是血缘宗族观念的物化体现。

三洲组团布局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与三洲是一个移民入迁的客家聚落有很大的关系。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客家人,在一次次中原动乱灾荒,筚路蓝缕,历尽艰辛的南迁过程中往往都不忘“负骨异土”,逐渐形成了“信神不如敬祖”的理念,其溯本追源、崇宗敬祖、敬宗收族的观念显得尤其突出。他们认为:“君子营建宫室,宗庙为先,诚以祖宗发源之地,支派皆多源于兹。”[1]只要能力所及,首先要办的事就是建祠、奉祖,或者将功成名就的先祖的祖屋改为祠堂。因此,三洲不仅宗祠林立,而且往往是三洲规格最高的公共建筑,其选址之用心,设计之巧妙,规模之恢宏,构建之缜密,用工之精细,含意之深邃,至今仍然是值得称道的。

三洲聚落所体现的多姓杂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组团形态既有一定的兼容性,又体现出了宗族聚居不可避免的排他性。在三洲现有的各姓居民中,温、丘、俞等姓先于戴氏迁入三洲,因此,他们的民居与宗祠位于聚落比较中心的位置。戴氏虽然后来,但人口繁衍很快,族中人才辈出,逐渐成为当地第一大姓,渐渐挤压了别姓的生存空间,包围甚至是突入了他们的民居组团。黄姓进入三洲的时间最晚,其时,戴氏居住组团已十分稳定,黄姓很难进入其中,只能在戴氏组团的外围,亦即聚落北面定居发展,从而形成了现有的聚落组团形态。

三洲聚落组团中的核心建筑——祠堂的形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宗祠,用于祭祖联宗,商议族中大事;另一种是祠、居合一的建筑,集宗祠与同姓支脉居住于一体,即主落建筑作为宗祠使用,两侧横屋作为住宅。戴氏祖庙明德堂、笃敬堂,戴添禄公祠,戴应寿将军祠以及黄氏、丘氏、俞氏家庙属于前者。这种祠堂一般为三开间的四合院,为“四水归田”格局,外围以山墙跌落围墙,整体布局干净利落。这种祠堂往往是各姓集资建造的,是各姓合族或本支祭祀、议事和举行公共活动的主要场所。

戴咸熙祠、戴庆腾公祠、戴道宾祠、戴永茂公祠等则属于后者。这种祠堂的中轴建筑一般由门厅、大厅与后堂组成,中间隔以天井;中轴建筑两侧或一侧建有面向主体开门窗的横屋。这种祠堂实际上是由民居改造发展而来的,往往是建房者的子孙为纪念他们而将民居的大厅改为祭祖的场所,但后堂

与两侧的横屋还居住着本房的子孙。他们本着“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与自己的祖先共居一室,每逢初一、十五均供奉如仪。这种祠堂的大量存在正是子孙们对先祖功业的肯定与推崇的体现,也体现了很强的凝聚力,将本房子孙都聚集在了周边。

三洲聚落组团体现出的以各姓祠堂为核心的血缘聚居的形态,呈现出一种由内向外自然生长的格局,是一种高度向心、内敛的空间结构。

(三) 回环往复的街巷体系

三洲村内的街巷体系是随着商业的发展和民居的增加而自然发展起来的。三洲村是古代汀州府重要的水陆交通的枢纽,宋代就形成了集镇的规模,集镇内也相应发展起了繁华的上街与下街两条街,统称老街。老街呈曲尺形,上街为西北—东南走向,北起石桥头,南至四角亭旁的三角店。从三角店开始,街道拐弯为东北—西南走向,一直通往明德堂,这段老街被统称为下街。老街长达百余米,街宽1.5—2.5米不等,街道两边共有数十家商店,其中较有影响的有药店济生堂、日生堂、宝源堂、广济堂、同安堂,布店复和昌布店、源丰布店等,其余如豆腐店、饮食店、食杂、小百货等琳琅满目,每月逢五逢十,周边的乡民、商客都前来赴墟,十分繁荣热闹。店铺一般以一层为主,高度不高,尺度亲切宜人;间或夹杂着几家民居跌落的高墙,整条街的天际线高低起伏,富有变化。

以老街为依托,三洲村内的其他街巷主要往南、往东、往北三面绵延发展。北面以北门路直接通往黄姓组团,南面与东面则以城墙坎巷、上乾路等小巷与下街以不同角度交接,蜿蜒曲折地通往南面的梨背巷和东面的东门路。其间还有许多小巷与这几条主要的街巷或平行,或交叉,或垂直,纵横交错,形成了一个回环往复,错综复杂的网状街巷系统,形似迷宫,外人进入很难不迷路。这些街巷中,上街、下街、梨背巷、东门路与北门路相对比较规整,组成了整个街巷体系的外轴,穿插其中的小巷一般路随房转,随宜布置,曲折有致,极其不规则,体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小巷的宽度在1-1.5米之间,两边都是密集的高墙民居,高墙窄巷的空间意象十分突出。民居间往往共墙相隔,隔而不断,总有门户相通。户户相连,家家相通,邻里和睦相处,互相周济。如今,三洲的街巷尺度基本保留原貌,只是原来的鹅卵石路面铺设大部分都被改为水泥铺设,主街两侧的建筑肌理、空间结构也有所改变,但基本格局尚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三洲开始往东北方向发展新村。

(下转第 113 页)

三、余论

汉语句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格式标记,但是这些标记的形成和自身的语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句法结构对其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汉语发展的过程中汉语句式不断丰富,其中一些句法格式标记起到了区分作用,这对于分解汉语因句式简单而句法结构语义复杂而造成的歧义问题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就注意力系统来说,句法格式标记对于儿童学习语言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 [1]蒋绍愚.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罗纳德·兰艾克.认知语法十讲[M].北京:外语教学与出版社,2007.
 [3]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综观[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4):367-377.
 [4]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M].2004.
 [5]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责任编辑 王云江]

Discussion on the structural mark of “give” in the beneficial structure

ZHANG Dong-zan

(College of Art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spects on the formative process of structural mark “give” in the beneficial structure, and compares a list of “beneficial” verbs with related meanings. This paper thinks that the semantic feature of “beneficial” and the syntactical structure of double objects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making “give” into a structural mark.

Key words: give; beneficial verbs; structural mark

(上接第90页)

四、结语

三洲聚落形态的形成,首先是在充分考虑周边自然地理环境,协调处理人地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此基础上,人们以血缘聚居的方式来发展组团,由小到大,由中心到周边不断扩展。不同姓氏的组团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碰撞和冲突,在不断调和中,大姓组团间基本以街巷为界限来界定,小姓的小组团则被分解或包围。在组团中,人们把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要素,比如,祠堂、店铺、私塾等聚集在民居周围,而把宗教神灵等要素安排在聚落的边缘与外围,形成了由己到他,由亲到疏、由

紧到松,层层推出的、类似“水波同心圆的差序格局”。^[2]这种格局实际上是以宗族认同感为核心的,同时兼顾了民生经济与聚落安全,具有较强的相对性与伸缩性。也正因此,三洲聚落形态无论是在物质还是在精神层面上都有了丰富的层次与内涵。

参考文献:

- [1][清]林牧.阳宅会心集(卷上)·宗祠说[M].清嘉庆十六年刻本.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8-30.
 [责任编辑 王云江]

Probing into the form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 in Sanzhou and its contributing factors

LI Hua-zhen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Department,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00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field survey and document research,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rms and characters of Sanzhou ancient villages, from the aspects of selection of site and borderline, distribution of the organized group and the streets system, etc. 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the inherent natural, social and cultural reasons in its forming, in order to deeply understand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Key words: Sanzhou ancient village; the forms of the settlement; the organized group